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苏联时代的中国 文学研究

——波兹涅耶娃汉学论集

[俄] 柳·波兹涅耶娃 著 李明滨 编选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苏联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波兹涅耶娃汉学论集

〔俄〕柳·波兹涅耶娃 著

李明滨 编选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波兹涅耶娃汉学论集 /
(俄罗斯)波兹涅耶娃著；李明滨编选. — 郑州：大象
出版社，2016. 12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347-8306-7

I. ①苏… II. ①波…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文
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3233 号

苏联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波兹涅耶娃汉学论集

[俄]柳·波兹涅耶娃 著

[中]李明滨 编选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耿晓谕
责任校对 牛志远
封面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新乡市获嘉县亢村镇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3800

电话 0373-5969992 5961789

波兹涅耶娃教授的学术成就

李明滨

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兹涅耶娃在中国文学研究上成就杰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汉学家。在她1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特地编选她的汉学论集，以资纪念。

柳鲍芙·德米特里耶夫娜·波兹涅耶娃（Любовь Дмитриевна Позднева，1908—1974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汉学世家。其父德·波兹涅耶夫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满蒙专业，长期任教于东方语言各专专业，曾任海参崴东方学院院长（1904—1906年），获中国颁授双龙勋章。伯父亚·波兹涅耶夫是蒙古学家，为海参崴东方学院的创校校长（1899—1903年）。波兹涅耶娃1908年6月20日出生于日本，当时其父正携家眷在日本从事讲学和研究，1910年全家返回圣彼得堡。

波兹涅耶娃在中学和中等音乐学校毕业后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32年毕业。她在这里受业于俄中两国本学科最好的学者，即“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郭沫若语）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年）院士和中国苏联文学翻译的先驱曹靖华教授。当年曹先生参加北伐战争失败后，为逃避国内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而流亡苏联，任教于列宁格勒大学和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波氏读大学的五年间始终由曹先生教授汉语语言文学。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是曹靖华的得意门生。曹先生曾夸奖她是“难得的多面手，很有才气”，说她开卷能读古文，开口能讲白话，提笔能写很好的中文文章。当她1956年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曹先生正好在莫斯科出差，便欣然应邀出席她的答辩仪式。

波兹涅耶娃大学毕业后，从1932年开始在海参崴执教，任教于中国师范专科学校（中国列宁学校）和远东大学。后来两校合并为“远东边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在这里，她结识了时任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中国部主任的张锡俦先生，后与之结婚。张回国后，解放初期就任刚成立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院长，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首任校长。

远东大学撤销后，波兹涅耶娃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办的学校教中国

学生俄语，同时在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教授中文，兼任外国文学出版社编辑。正是从那时（1935年）起，她开始翻译并发表鲁迅、丁玲和老舍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也为《世界文学》杂志撰稿。1943年，她考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研究生班，并于1944年开始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任教，以后转到语文系（亚非学院），仍教授中国语言文学。波兹涅耶娃长期担任中国语文教研室主任。至1974年8月25日去世，她前后任教达40年之久。

波兹涅耶娃于1946年以《元稹的〈莺莺传〉》论文获副博士学位，1956年以《鲁迅的创作道路》论文获博士学位，并于1957年和1958年先后晋升高级研究员和教授。她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获得“罗蒙诺索夫”奖金（1952年）、“罗蒙诺索夫”奖状（1959年）和奖章（1973年）。

波氏从1949年到1959年担任教研室主任，先是历史系东方语教研室，后为语文系中文教研室。再后来莫斯科大学成立亚非学院，她即成了该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相当于现在的系主任）。她主管教学期间，以其远见卓识对教学工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她认为，学生在具备中文实践能力之外，应当加强相关的理论修养和拓展广阔的知识面。因此，在语言教学中引进汉语史、方言学等课程，在文学方面则不局限于设范文选读课，而是在莫斯科大学乃至全苏率先开设了系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同时增设西方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史等课程。她从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到教学讲义都实行改革，使得该校培养出来的汉学人才在理论、知识和技能方面三者兼备，既可适应职业部门实践工作的需要，又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这样的教改使教学工作面貌焕然一新。改革还扩展至整个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学。波氏被视为东方语言文学教学的改革家。

莫斯科大学的文学史教程，从横向上看，有东方文学的全貌，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波斯等所有东方国家文学；从纵向上看，以中国文学为例，即从古代、中世纪、近代到现代，呈现了历史的脉络。如今该校保存有一部完整的东方文学史，由四卷（五册）组成：《古代东方文学》、《中世纪东方文学》（两册）、《近代东方文学》和《现代东方文学》。其中的中国文学部分由波氏主编。她和其他东方文学教授合力促成这部巨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问世。这也是波氏留给后代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从1959年至1973年，波氏虽然不再担任教研室主任的职务，但已是众望所归的学科带头人。在莫斯科大学任教的30年间，她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波氏的学术研究一向兼顾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1949年她翻译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该书获得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的苏联政府奖）提供了文本条件。1954年她编选《鲁迅选集》四卷本（近1500页）并翻译了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她写出详尽的“跋”（“序”则为费德林所作），其独特的见解甚至引起国外注意，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1956年以鲁迅为题材的博士论文很快就于1959年以《鲁迅评传》（原书名为《鲁迅·生平与创作（1881—1936）》，共三编九章五十节，译成中文长达56万字）为书名出版，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品。当这部著作在40多年后译成中文出版时，我国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林非教授就称赞，这位“俄罗斯汉学前辈，实在称得上是勤奋踏实和严肃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的榜样，她涉及的材料之广博，论述的笔法之精细”，列出的鲁迅文章之出处和背景材料，“真可以说是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确实是十分令人钦佩的”。林非先生又说：“鲁迅先生是一位博大精深和浩瀚无际的伟大作家和思想家……对他进行如此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劳作，何况还是出自她这位外国汉学家之手，就更令人惊叹不止了。”（《鲁迅评传》中译本序）

鲁迅研究学者、译者颜雄教授盛赞波氏数十年如一日，“勤奋谨严，实事求是的学风铸就了本书的学术品位”，而且与同时代人相较，它是鲁迅研究作品中“一部篇幅最大的评传式专著”（1959年，56万字），而此前已出版的同类著作仅有“曹聚仁《鲁迅评传》（1937年8月），约20万字；小田巖夫《鲁迅传》（范泉译，1946年9月），不到10万字；王士著《鲁迅传》（1948年1月），近35万字；朱正《鲁迅传略》（1956年12月）是作为略传写的，约10万字”。（《鲁迅评传》中译本后记）

此外，波氏还为苏联的“伟人丛书”撰写了一册《鲁迅》（1957年），流传很广，后来在197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90周年，还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

波氏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著译甚丰，重要的有1954年为北京大学王力教授《汉语语法纲要》俄译本作的序，由于《汉语语法纲要》一书的例句大多采自《红楼梦》，为便于俄文读者理解，波氏不得不在序文中全面而详细地评论那部古典小说，结果序文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迅即被我国评论界看中，译成《论〈红楼梦〉》于1955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波氏所译《列子》和《庄子》（1967年）是俄国首次全译本，被她汇编成《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家——

杨朱、列子、庄子》一书出版。

不过波氏的惊人之举还在于破除中国文学史的传统体例。

在苏联，东方文学中也有欧洲文学“文艺复兴”的观点，起先是康拉德院士在《中国文学史概论》（1959年）中提出的。此论一出，苏联汉学界立刻舆论哗然，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汉学家费德林说：“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欧洲发生过的那种复兴或文艺复兴，对中国并不是必然的，我们有权把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视作人类进化的世界性规律的现实，但绝不是欧洲模式或标准的某种变异。”（《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1968年）

但在长期的争论中，波氏一直力挺康拉德。她不但赞成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艺复兴时期”，而且认为该时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8—10世纪，即唐、宋代，为爱情自由抒情诗和短篇传奇小说流行；第二阶段在10—12世纪，宋末元初，盛行政论散文和哲理小说。她进一步发挥，主张中国文学史上还有“启蒙主义时期”（即类似欧洲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当然，这也给那场论争激起更大的波澜。

论争归论争，波氏并不满足于空口议论，而是立即付诸行动：用欧洲文学的理论和观念来构建中国文学史的体例，编撰出莫斯科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乃至东方文学史）。体例如下：

按世界历史的大时代划分为四个时代：

- 1.古代文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2世纪，包括夏商周、战国和汉代。
- 2.中世纪文学，从3世纪到17世纪前半期，包括六朝和唐、宋、元、明代。
- 3.近代文学，从17世纪前半期到20世纪初，即清代。
- 4.现代文学，从1917年到1945年。

内容、撰述则按概论和专论两类安排。

她解释破除中国文学史传统体例的理由，认为那套体例的公式“分期按朝代，分类看体裁”有很大的缺点。一是那样的分期并不切合文学发展的过程，因为王朝的覆灭并不表示某种文学过程的终结。况且朝代分期失之过细，到底不如古代、近代、现代等大历史时代的概念清晰。二是那样的分类只能反映某种体裁的“极盛时期”，如唐诗、宋词、元曲，不能告诉人们该体裁的发展过程。例如，戏曲不可能是在蒙古人入主中原那80年内才创造出来的，它在此前和此后该如何？此外，旧的写法只能使人注意每一个国家文学的特点，它妨碍人们看清各国文学的共同点。如果坚持每个民族按自己的朝代计算纪年，

那就不能按历史的大时代来对各国文学的发展作总体的研究。如果坚持每个民族传统的体裁概念，那就看不到共同的文学现象。

在比较文学界历来流行三种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类型学研究，分别代表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俄国学派。不过多年以前有中国学者主张，还有第四种，系代表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曰诠释法，即用欧洲文学的理论和观点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如若此说成立，那么俄国汉学家应该早就开始实践了。波兹涅耶娃正是用了欧洲的文学史观破除中国文学史的体例，并与她的同人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了一部别样的中国文学史。不管它对一个个具体的中国文学现象的诠释是否正确，或是有过分比附之处——俄国汉学界也有断然相反的论辩，但那种按大历史时代的分期，确实是俄国和欧洲汉学界的习惯，便于他们对中国文学史的理解。一个“古代文学”的概念就便于他们联想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相同背景，比单独去弄懂“楚”辞、“汉”赋的朝代观念要容易得多。这不也是一种比较文学吗？所以波氏主编的那部文学史巨著俄苏学生可以接受。这可能也为外国学者书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范本，即如何引导本国读者更快地理解他们比较陌生的中国文学。

波兹涅耶娃毕生讲授和研究中国文学，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充满感情，她在20世纪50年代来北京外国语学院时，数次在校内举办讲座；也曾在中国讲学，讲鲁迅，也论《红楼梦》。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中苏两国思想论争的形势严峻而断了同中国的来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去张锡传院长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东院的寓所拜望他，还看到张院长厅堂里有波氏年轻时的照片。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曾先后两次在莫斯科和北京巧遇他们的女儿和女婿。第二次会面他们的女儿还很兴奋地告诉我：此行是回张院长的老家四川涪陵省亲。据说，乡亲们非常热情，虽然语言不通（她已经不会讲汉语了），但一看她的长相，便高声叫道：“不错，是我们的孩子回来了！”乡亲们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接待，给她的故乡之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波兹涅耶娃教授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深缅怀这位对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大学者。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波兹涅耶娃教授的学术成就·····	1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第二版）序言·····	1
《丁玲选集》俄译本序言·····	7
《鲁迅评传》（选）之一 与传统的决裂·····	18
《鲁迅评传》（选）之二 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间·····	25
《鲁迅评传》（选）之三 外国文学研究的开端·····	36
《鲁迅评传》（选）之四 从革命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 ·····	47
《鲁迅评传》（选）之五 与民族遗产·····	52
《鲁迅评传》（选）之六 杂文中的讽喻形象·····	65
《鲁迅评传》（选）之七 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和 左翼作家联盟的建立·····	73
论《红楼梦》·····	90
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	103
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	163
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汉语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情况·····	172
附录一：“中俄文字之交”又一页 ——关于波兹涅耶娃著《鲁迅评传》的由来及评价·····	179
附录二：波兹涅耶娃的中国文学史观、鲁迅论与 《文心雕龙》论·····	189
附录三：波兹涅耶娃与中国的特殊情缘·····	201
附录四：波兹涅耶娃主要学术成就·····	204
后 记·····	21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第二版）序言

中国女作家丁玲的荣获1951年斯大林金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中国农村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作品事件是在农村没收地主土地、分发地主余财、唤起群众阶级觉悟的最激烈的斗争时期展开的。

这部小说全面而非简单化地反映了土地改革这一复杂进程。作品描写了解放区的新人、新的组织——农村党支部、农救会、民兵、学校等已经牢牢进入解放区农村日常生活的一切新生事物；同时，作家也非常注意描写农村的反动势力，它们利用种种手段延缓其灭亡。

丁玲在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挥霍者李子俊大吃大喝逐渐破产，败光了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怯懦地逃离新的人民政权；钱文贵极其阴险，他极力维护其统治地位，企图在美国的武装干涉中捞取救命稻草。

这样的地主，按民间说法，其计谋超过古代的军事战略家诸葛亮。他眯缝着小眼儿，假装冷淡地观照世界：帝国主义将领及其傀儡能否主宰中国？日本军国主义军人能否占领全球？——他总是走运，在任何政权下都能发大财，甚至在地方民主政权建立后，他仍然悠闲地坐在马扎上，扇着扇子，慢慢地品着香茶，尽管他心里远不平静。他心中怀有一个夙愿，就是用美国大炮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尽快到来！

但是，他作威作福的时代现已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早期变革已过去二十年。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为保护统一战线利益，对地主只是限制剥削——减少租金降低高利贷百分比率，那么日本投降后，为了清除地主中供职于日本侵略者的汉奸，则是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内战爆发时，每个解放区又都以各自的方式展开了同地主的斗争。直到1947年中共召开的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才总结实行土地改革的全部经验尤其是近两年的土地改革经验，制定了全国统一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利用这一武器，中国解放区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地方政权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向封建社会残余——占农村人口不到10%却占据70%—80%耕地的人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

在丁玲的长篇小说中，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把其全部的复杂性展现在我们

面前。暖水屯村党支部书记张裕民认为“谁也不敢公开反对土改”，但是，他也了解摆在农村党员干部面前的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愚昧落后的农民，千百年来遭受地主剥削的压制，长期被宗族关系束缚住、被宗教信仰这张网——从佛道的报应和灵魂转世说到基督教“顺从”的说教及巫师的简短咒语纠缠着，绝大部分人还相信压迫者的权势，不打算同其斗争。

当农会主席程仁要佃农郭柏仁到地主家要回地契时，郭柏仁反复唠叨：“唉，地是人家（地主）的嘛……唉，地是人家的嘛。”当时农民还没觉悟，有些人甚至偷偷地把农会分给他们的田还给地主。为了激发农民的阶级仇恨，为了使他们懂得他们贫穷、无生活保障的原因，应该让他们自己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还应让他们懂得，不是农会、农会主席夺走了地主的地契，而是农民自己，即每个佃农要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只有那些认识到土地不是地主的而是人民的，自己是向强盗讨回自己东西的人，才能提出这种要求。在这方面，摆在农民积极分子面前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发动农民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团结农民。

第二个困难是土地改革是在战争时期进行的。丁玲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在全国战胜蒋介石集团之前。

那时，八路军只解放了北方部分地区，蒋介石集团当时还占据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利益集团相当巧妙地演了一出恐吓农民的把戏：‘他们四处传播有关美国军事战术威力被夸大的传闻，捏造敌军“胜利”的消息。

“报纸上有什么‘国军’打胜仗的地方，就同人讲讲，编几条也不要紧……”吸血鬼钱文贵教唆自己的走卒——小学教员任国忠说。这样，卖身投靠钱文贵的民兵张正典和另一个地主、汉奸、甲长江世荣的忠实传话筒——白巫婆就干了这样的破坏活动。他们不倦地低声向落后的农民们散布什么“白先生显神，真龙天子在北京……百姓要安分守己，一定有好报”。

为了发动农民，解除其疑虑，本地积极分子和区工作队员们花了很大力气：他们反对钱文贵的狂妄和空谈，揭露背叛人民和党的张正典。大多数积极分子都已很好地分清谁是新中国的朋友，谁是新中国的敌人。对觉悟低的人，进行劝说和鼓励。但是，他们还缺乏政治生活经验，很难对付那些老奸巨猾的反动政客的一切阴谋诡计。这时他们的老朋友、前游击队长、宣传员章品来帮助他们了。作者在作品中特别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他勇敢地解决了农村复杂关系的一切症结，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按照章品的建议，村政权逮捕了钱文贵。很快，村民们确信了新秩序是

稳固的，于是，就连那些最落后的农民也跑到法庭上，当面控诉钱文贵。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已经起来斗争的贫雇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是企图利用农民暴动的陈旧方法与地主斗争，以便消灭敌人的肉体。正如当年那些没有无产者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一样，总会遭到失败。共产党人做了很多努力向农民们解释：现在时代不同了，政权已掌握在人民手中。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基本优点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人，就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描写中国农村的活生生的人。丁玲继承中国近代长篇小说传统，将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写成一个单独的短篇，从而展示其经历。作者巧妙地运用这一手法展现了主人公们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作为，因为人民只信赖那些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的不妥协的战士们。只有从可怕的旧社会去观照，才能彻底认识中国贫雇农生活的巨大转变——他们从千百年来的地主的奴隶，而今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亲自向农会提出首先没收地主果园的问题。你瞧，果园里可是千载难逢的大丰收呀！而地主们听到这一消息后，便急忙卖出自家园子的水果。于是，农会立即做出决定，在重分果园前，要在果园里站岗放哨保护果子，不等熟透就集体抢收，卖了钱分给农民。

这是谁家的园子呀！李宝堂在这里指挥着。李宝堂在园子里看着别人下果子，替别人下果子已经二十年了，他总是不爱说话，沉默的，像无动于衷似的不断工作。不知道果子是又香又甜似的，拿着的是土块，是砖石那么一点也没有喜悦的感觉。可是今天呢，他的嗅觉像和大地一同苏醒了过来，像第一次才发现这葱郁的，茂盛的，富厚的环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七》）

女作家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就重点描写了领导这些感情。这些感情是战胜剥削者，战胜永无休止的贫穷带来的新生事物。自然，面临敌军的第一次进犯威胁时，共产党员和民兵战士成长起来了，青年部队唱着歌投入了防御建设，农民群众万众一心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和民主政权。

女作家丁玲生于1904年，很年轻时就步入文坛。1927年，她开始在中国进步刊物上发表作品。很快，她的作品就引起了读者和进步舆论界的关注。1931年，丁玲编辑左联刊物《北斗》，同年，其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捕杀。1933年，丁玲被捕，其最优秀的作品（《母亲》《水》等）列入被禁文学作品清单。但是，法西斯分子未能摧毁她的意志，她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出狱后就

来到北方，以全部精力投入统一战线的准备工作。

丁玲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与八路军一起工作，住在民主地区首都——延安。她领导着自己创办的作家前线工作队，培养了许多天才的年轻干部，出版了一系列文集——《一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集》及其他。

从国内战争和美帝干涉开始，丁玲的愿望就是要奔赴实行土地改革的前线。女作家丁玲在本书序言中谈到自己的工作和当时的创作打算时说：

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参加了怀来土改工作团，后来转到涿鹿县，但是，九月底就仓促回到阜平。这一阶段工作没有机会很好总结。但住在阜平，我没有别的工作，同时又有些人物萦回在脑际，于是就计划动笔写这本小说。我当时的希望很小，只想把这一阶段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同时还像一个村子，有那么一群活动的人，人物不太概念化就行了。原计划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桑干河一带护地队的材料，是很生动的材料。护地队的领导人，就是小说中县委宣传部长章品同志。那一带地方我曾走过好些，因此就幻想再回到那里去，好接着写第二部，因此在我写的当中，常常想留些伏笔。文章写了一半，已经到了一九四七年土地复查的时候，我自己动摇了，想再下去多经历些群众斗争，来弥补我生活和写作中的不足。于是我搁下了笔，跟着去冀中行唐兜了一个圈子，最后回到阜平。我明白那些生活对我全是有用的。但对写这本小书实际材料不多，我便又继续写下去。我写了三个半月，送走了整个夏天。我用较大的力量写完了第一阶段，闹斗争这一部分。刚想写分土地的第二部分，《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了，便参加了土地会议，对继续写下去又发生动摇。我决心先下去参加平分土地的工作，我到获鹿的一个村子工作了四个多月，今年四月底才回到了联大，我原来的计划因为参加了这次工作有些变更了，我觉得原定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没有什么写的必要，因为前年的那次分地和参军，都是在很不彻底，粗枝大叶，马马虎虎了事的，固然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但那些工作作风实不足为法，考虑再四，决定压缩，而别的比较新的材料也无法堆砌上来，可以另订计划。因此小说后边便没有把问题发展开去。加上国际妇女会召开在即，行期匆促，就更促成了我的草率，因为路途的遥远和艰难，我不得不把这一工作匆匆告一结束。如果将来有空，我可再加以修整吧。（《写在前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言》）

女作家写的前言，简洁而冷静地描写了自己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那时她很忙，很少有空闲时间，曾不止一次中断创作工作。当时在全国展开的紧张的政治活动，需要更多的人参加，所以，后来文学批判家周扬、诗人艾青和其他许多人士也都去搞土地改革，这并不是偶然的。那时，丁玲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她是中国文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担任《文学与艺术》编辑数年，后来又调到《人民文学》，在那里仍然负责青年作家和编辑人员工作，以培养新的干部尤其是编辑人员——这些人员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缺乏的。

丁玲不止一次到过苏联，还曾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妇女民主联盟代表大会，也是出席巴黎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丁玲是苏联的朋友，是争取世界和平的积极战士。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问世，表明丁玲的创作已进入符合创作规律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篇小说《水》中，丁玲就现实主义地描写了全国各地农民的破产、贫困化及由于国家缺乏抗洪措施而导致灾民大规模地死于洪水中的可怕画面。

作家描写的水灾——不是惩罚罪孽的神力降下的自然灾害，而是江河的防水堤、拦洪坝等防护建筑多年失修而遭到毁坏的结果。虽然修堤的款项年年准时征收，但是收上来的钱很快就落入官僚资本家的深不可测的腰包。丁玲揭示出，资本家甚至利用人民的灾难和死亡大发横财。他们在全国各地广征募捐，但是，劳动人民给自己的受灾兄弟捐献的血汗钱，却成了执政集团的一笔收益。

人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毛泽东指出的进行土地改革，进行反抗敌人的武装斗争。丁玲的中篇小说《水》，就是以农民暴动的画面而告终：

于是天将蒙蒙亮的时候，这队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咆哮着，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水》）

如果说丁玲1931年写成的中篇小说《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初期阶段，那么，其1948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描写的则是经过多年不断斗争而取得的盼望已久的胜利成果，当年“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已变成了生活现实。这部作品，就其艺术技巧、展示形象和事件的现实主义手法而论，表明了女作家的长足进步。在20世纪30年代，造反的人民以其巨大的力量展示了自己。在这部作品中，用毛泽东“中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武装起来的女作家，善于表现那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工农兵形象。这是丁玲对中国领袖毛泽东召唤的一种回应——毛泽东

当年号召中国文艺工作者反对“为着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文艺”，反对奴隶文化与奴隶文学，为实现中国新文化主将鲁迅的理想、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文化而奋斗。

“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从20世纪初到其逝世，多次倡导中国作家学习俄国文学、学习苏联文化。为此，他翻译了许多俄国文学作品，还组织、帮助其他译者翻译。他的繁重而紧张的翻译活动，今天终于结出了硕果：即中国作家们善于高屋建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工人的自由劳动及在这一进程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作家们在精细地学习、研究苏联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满有根据地说，中国作家们向毛泽东指引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之路的转变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成，是因为在苏联早已创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且中国的同行们也在努力地学习它。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这种最早的作品之一。它反映了早期建设自己生活的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的光明而蓬勃发展的事业。必须承认，这部作品对创建新民主主义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只是丁玲，还有其他许多作家，诸如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周立波、描写了修复发电厂的中篇小说的作者草明及其他一些作家，也都创作了反映新民主主义建设时代的作品。这些作品为后续作家指出了创作道路。

中国进步作家的成就在于他们善于表现发生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丁玲与其他作家被授予斯大林文学奖金，表明了中国文学事业迅速而巨大的发展。

(宋绍香 译)

译后记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第二版），波兹涅耶娃译，托佩尔编校，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丁玲选集》俄译本序言

人民革命胜利前，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很难冲破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设置的障碍传到我们这里。但现在，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两国人民亲密的兄弟般的友谊了，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迅速到达苏联读者面前了。然而，过去发行量不多（1500—2000册）的旧读物在中国已绝版。所以，不久前中国着手再版许多书籍，这对填补过去年代的空白很有助益。譬如，文化部长茅盾于1951—195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作家于1919—1942年创作的作品选集丛书。丛书作者中的许多人早已牺牲，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柔石、殷夫、胡也频30年代死于国民党刽子手屠刀下；闻一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不久被国民党杀害；郁达夫被日军杀害。这套丛书中还有新中国的积极建设者们的作品，诸如作家郭沫若和茅盾、剧作家田汉、诗人艾青等。《丁玲选集》也列入了该丛书，现在首次译成俄文大量出版发行。

丁玲（原名蒋冰之）生于1904年。她最初的作品发表于1927年的刊物上。因此，她是始于191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活动家。

1919年5月4日，上海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转让给日本的决定。以此为起点，在新的情况下，受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中国掀起了一场革命运动。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斗争，而于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肩负起了领导这场运动的重任。这一时期，中国的进步文学同解放运动相结合，积极参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持民主革命观点的作家们为了反对维系旧家庭制度的封建礼教，反对阻碍中国科学与文学发展的封建哲学思想，同资产阶级文学家们结成了特殊的统一战线。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听不懂的为达官贵人所扶持的文言文。但是，先进的左翼文学很快便同右翼文学展开了论战，反对鼓吹欧美的《最后的演说》，模仿西方颓废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作品。作家之间的分裂越来越厉害。在1924—1927年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进步的文学家们组成了自己的营垒，而资产阶级作家也公开同封建遗老们联合起来。由于国民党1927年4月的反革命政变及随之而来

的血腥恐怖，这两大文学营垒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但是，这种镇压并没吓倒进步的文学家们，而是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联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正当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之时，进步的文学家们同样粉碎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围剿”，他们顽强地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唯一正确的世界观，用自己的笔为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服务。

所以，20年代的中国文坛，各种流派、各种势力、各种思潮丛生并存，形成了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出版了大量的附有形形色色的宗旨和宣言的刊物。旧事物的卫道士们视革新者们为中国“固有”文化的危害者，号叫要学生们坐下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些在英、美大学里镀过金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极力颂扬中国的旧文化同杜威之流的学说相混合的一切新“成就”。中世纪长篇小说的模仿者们写出大量的描写“郎才女貌”题材的爱情小说，这些陈词滥调全是从美国的强盗、色情书籍中拣来的破货，形形色色，离奇古怪！与这条猛烈抨击年轻的进步文学的阵线相抗衡的则是成长中的已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新文学阵线。

鲁迅，中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最大的文学大师。1927年以后，他逐渐获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鲁迅把传播俄苏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1921年年初，作家叶圣陶、许地山，文学评论家郑振铎、茅盾（后来成为作家）联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并出版了机关刊物《小说月报》。该研究会的成员们刻苦学习外国文学中的进步作品，精心研究各种文艺思潮的理论基础。他们遵循“生活的诗意”这一口号，提倡“血与泪”的文学，其基本特征是写实主义。团结在《创造》杂志周围的如郭沫若等作家和诗人们，从浪漫主义出发，主张推翻旧世界。这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正如高尔基所定义的那样，这种浪漫主义“努力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唤起他们去变革现实，反对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在这群革新者之间，在无情地批判一切反动、腐朽事物的人们中间也展开了一场具有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特色的争论。后来随着1924—1927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或参加了人民革命军，或以笔为武器投入了战斗。最后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下，在左翼作家联盟中团结了起来。

到1927年，老一代革命家已经同旧世界——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同新的敌人——帝国主义利益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首次斗争，但是斗争未能胜